



2 037 3074 8

唐詩研究論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出版說明

为了把中国古典文学部門的研究成果及时地加以集中，以
便于讀者和研究者的閱讀参考，我社在1956年出版了《楚辞》等
六种研究論文集，1958年初，又繼續編輯了《詩經》等六种研究
論文集。全国大跃进后，我們集中全力出重点書，这一批属于資
料性的論文集，延至今日才与讀者見面。

当时我們对論文的收輯，范围很寬，而且为了“忠实于历
史”，“不作任何論点上的、原則上的修改”，仅仅是为了反映那
一个阶段社会上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实况。

經過厚古薄今批判后，社会上又展开了对资产阶级的学术
思想的批判，声势极为浩大，新生力量蓬勃出現，这是很好的現
象。但学术思想必須有批判，也有反批判，“玉石愈攻而愈晶，真
理愈辯而愈明”，学术思想不經過反复的爭鳴，是不会得到坚实的
結論的。收在这里的論文，在我們看来，其中有确有研究和独
創見解的，也有論点成为問題、可以大大展开討論的；但我們还
是把它出版了：一方面是讓我們从过去的脚印上来看出今后发
展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引起学术界作更深入的研究和討論，
使我們的学术，得以再提高一步。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1959年1月19日

目 录

- 論初唐四杰及其詩 刘开揚 (1)
- 釋“河嶽英靈集序”論盛唐詩歌 王運熙 (26)
- 王維詩簡論 邓魁英 (37)
- 談孟浩然的“隱逸” 陈貽焮 (46)
- 試論高适的詩 刘开揚 (53)
- 岑參詩是歌頌武功的嗎 賴寒吹 林 楠 (64)
- 岑參生年的推測 曹濟平 (70)
- 李白詩歌的浪漫主义精神 謝善繼 (74)
- 略論李白 張志岳 (113)
- 李白“清平調”三章的解釋 俞平伯 (128)
- 談李白的“蜀道難” 王運熙 (140)
- 关于李白的“梁園吟”的創作年代問題 戊 木 (145)
- 杜甫的道路 刘大杰 (150)
- 学习人民語言的詩人——杜甫 蕭滌非 (158)
- 論杜甫从秦州入蜀諸詩篇中的自我形象 王 我 (170)
- 略論杜甫的諷刺 李汝倫 (183)
- 元結和他的作品 湯肇民 (198)

关于孟郊的生平及其创作 华忱之 (224)
试论张籍诗的现实意义 张国伟 (237)

关于白居易 郭沫若 (247)

白居易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谭丕模 (253)

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及其创作 萧文苑 (268)

“琵琶行”的音乐描写 蒋礼鸿 (296)

白居易及其讽谕诗 游国恩 (301)

读“秦中吟”中的“伤宅”“立碑”二诗 游国恩 (309)

白居易关于农民的诗 王拾遗 (316)

谈李义山 谢无量 (321)

试论李商隐的七言律诗 萧艾 (329)

关于李义山的诗 王孟白 (341)

李商隐与令狐父子 黄清士 (353)

杜牧诗简论 缪钺 (360)

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 缪钺 (371)

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 缪钺 (390)

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 萧滌非 (402)

聂夷中和他的诗 丁力 (412)

关于“聂夷中和他的诗”的一些问题 单寿年 (420)

中国唐代的诗歌(附录)..... H. T. 费道连柯 孙寿璋译 (422)

論初唐四杰及其詩

刘开揚

王勃、楊炯、卢照邻和駱宾王四人，大都生于唐太宗貞观年間，他們的文艺活动集中于高宗时代，所以被称为“初唐四杰”。

四人的生卒年代有确切記載的只有王勃一人，据楊炯“王子安集序”：“春秋二十八，皇唐上元三年秋八月，不改其乐，顏氏斯殂。”与王勃在其“春思賦”中所称“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的年岁相符合。可見“旧唐書”本传说他死于上元二年和“新唐書”本传说他年二十九都是誤記，他應該生于太宗貞观二十三年（公元六四九年），死于高宗上元三年（六七六年），年二十八岁。

楊炯卒年不可考，但“旧唐書”本传載他于武后如意元年（六九二年）还向則天献“孟兰盆賦”，他的文集有“后周明威將軍梁公神道碑”，提及梁死于长寿二年（六九三年）二月，其时楊炯还活着，在四杰中恐他死得最晚。又他的文集有一篇“从弟去盈墓志銘”，記他的弟弟“春秋二十有六，以上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歿于京师”（“盈川集”卷九），可見他的生年当比他的生在公元六五一年的弟弟稍前，和王勃的生年相近。

卢照邻的生卒年代最多异說，如陆侃如、馮沅君的“中国詩史”定为六三七——六九〇（？）年，苏雪林“唐詩概論”以为約生于六五〇——六八九年，陈子展“唐代文学史”也以为生于六五〇年。究竟哪一年比較近实些？这是不可不加一番考証的。

按“旧唐書”本传记叙卢照邻的一生道：

（卢）年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蒼雅及經史，博学善屬文，初授邓王府典签，……后拜新都尉，因染风疾去官，处太白山中，以服餌为事，后疾轉篤，徙居阳翟之具茨山，著“释疾文”、“五悲”等誦，……自投颍水而死，时年四十。

曹宪是隋朝的秘書学士，又是当时著名的文字学大师，“旧唐書”“儒学列传”載貞观中太宗征宪为弘文館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太宗讀書遇有难字即录以問宪。据此，卢照邻向他学蒼雅也應該是去到揚州他的家乡的（卢的“释疾文”說“訪旧篆于南越”，当即与此行有关）。王义方則史載他博通五經，高宗显庆末罢官后講学于昌乐（“旧唐書”“忠义列传”），但我考証那时卢照邻已經不止十余岁而是二十余岁（說詳下），故我以为他的向王学习，是早年在揚州学完蒼雅后北返，到泗州漣水王义方的家乡去学的（“释疾文”所謂“得遺書于东魯”，或即与此行有关）。

至于卢照邻的做邓王府典签，應該在此稍后，“旧唐書”“高祖二十二子列传”系于貞观二十三年以前，“新唐書”“高祖諸子列传”則不記年，惟张鷟“朝野僉載”卷六記卢初仕的年岁較明白，他說：

（卢）弱冠，拜邓王府典签。

按卢照邻在六七三年做的“病梨树賦”，序文称“余年垂强仕”，按“礼記”：“四十强而仕”，則其弱冠之年当为高宗永徽五年（六五四年）左右，他又說：

（邓）主有書十二車，照邻总披覽，略能記憶。

足見卢照邻做典签还不止一二年。卢的“五悲文”說：

自言少年游宦，来从北燕，淮南芳桂之岭，岷北明珠之川。

邓王曾兼邓、梁、黄、寿、襄五州刺史，与所述区域也相符合。

稍后，是他拜新都尉的时间，可以从他的詩文中約略看出。
“四庫提要”說：

集中“相里夫人檀龜序”称乾封紀岁，当为乾封元年丙寅，“对蜀父老問”称龙集荒落，当为总章二年己巳，皆在益州时所作，“病梨树賦”称癸酉之岁臥病长安，則其罢官当在咸亨四年以前，計其栖迟一尉，仅五六年。

从乾封元年（六六六年）到咸亨二年（六七一年，按卢在“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文中称：“法师又于咸亨二年正月十八日寢疾之际……”），这段时间可以确定卢照邻是在西蜀的，但是說他栖迟一尉仅五六年則未必然。据“早度分水岭”一詩“丁年游蜀道，斑鬢向长安”看，他應該在高宗显庆年間就去到西蜀了。“全唐詩”称丁年一作千年，斑鬢一作万里，“千年游蜀道”是不可解的，除非是“十年游蜀道”之誤，但不管怎样，卢照邻在西蜀是不止住过五六年的。

需要附带說明，閻一多在“四杰”一文（“閻一多全集”第三册）中引据“唐会要”卷八二所載显庆三年（閻氏誤为二年）卢照邻与宋令文、孟詵等向太白山人孙思邈执师贊之礼一事是显然錯誤的，“旧唐書：方伎列传”这样記載：

太宗即位，召（孙思邈）詣京師，……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显庆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詵、卢照邻等执師贊之礼以事焉。

“新唐書”“隱逸列传”所載除显庆四年作显庆中以外，其余完全相同，“大唐新語”卷十只記卢向孙学习为高宗時事，沒有記年，新旧唐書的这个記載是比較确切可靠的。上元元年（六七四年）

岁次为甲戌，与“病梨树赋”所称癸酉岁相接，或者卢照邻第一年和孙思邈见面，第二年因治病向孙执弟子礼，学老庄及医学，頗有可能。只是孙的寓居鄱阳公主邑司是在咸亨四年而不是在上元元年（見下引文），新旧書所記自不如卢照邻所記为可靠。

“唐会要”所称显庆三年卢向孙学习，我以为有不合者三：（一）卢照邻“释疾文”自叙說：“先朝好吏，予方学于孔墨；今上好法，予晚受乎老庄”，显庆三年（六五八年）卢仅二十余岁，怎么能說“晚受乎老庄”呢？（二）如果承認卢向孙学习是在他离蜀以后（參看“病梨树赋”序、“大唐新語”卷十和“孙思邈传”便知），則显庆三年王勃仅十岁，而卢照邻前此在蜀中与王勃游玄武山賦詩时，楊炯“王子安集序”記于十四岁以后，王勃“入蜀紀行詩序”并明說：“总章二年（六六九年）五月癸卯，余自常（长）安观景物于蜀，……迨弥月而臻焉。”“游山庙序”說：“吾之有生二十載矣，……粵以胜友良暇，相与游于玄武西山庙，盖蜀郡三灵峰也。”这年代就是显然不相合的。（三）“唐会要”說孙思邈年九十余，其实这年他只有七十多岁。看卢照邻“病梨树赋”序里說：

癸酉之岁，余臥病于长安光德坊之官舍，……时有处士孙思邈居之，……自云开皇辛酉岁生，今年九十二矣，共語周齐間事，历历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岁人也。

这清楚地告訴了我們，孙思邈在癸酉岁（咸亨四年，六七三年）自称九十二岁（如生于开皇辛酉岁則还不到这岁数），据卢照邻的推想也不过百岁，那么显庆三年是只有七十多岁的，可見“唐会要”所称当年年九十余是錯誤的。

“朝野僉載”还說：“（照邻）为益州新都尉，秩滿，婆娑蜀中，放曠詩酒。”（卷六）說明卢照邻还不是一罢官就离开西蜀的。总计他在蜀应有十几年之久。从他的“还赴蜀中貽示京邑游好”看，

他中間还回到过长安一次。“对蜀父老問”說：

大唐之有天下也，出入三代，五十余載（自六一八年到六六九年），月竄求庭，風丘款塞，……若余者十五而志于學，四十而無聞焉。自然，“四十而無聞”是“論語”里的一句陳言，不能說寫這樣的文章時盧照鄰正好是四十歲，但我以為總得在三十五歲以上才好這樣說的（正如“十五而志于學”也是用“論語”里的話，但他志學總應在十歲以後）。還可証以上面提到的他在六七三年所作“病梨樹賦”序文說的：“余年垂強仕，則有幽憂之疾。”如定六六九年為三十五歲，則六七三年恰為三十九歲，與“年垂強仕”也相合。由此我推定盧照鄰當生于六三五年。如照陸、馮兩先生所說的六三七年生，則六七三年他三十七歲，還可說是“年垂強仕”，六六九年却只有三十三歲，怎么好說“四十而無聞”呢？更不要說陳、蘇等人的說法了。

盧照鄰的死更是一個問題，“舊唐書”本傳說他死時年四十，顯然是不妥當的，我們既已指明他在六六九年已經三十五歲，而他在“寄裴舍人諸公遺衣直藥書”里說：“余家咸亨中良賤百口，自丁家難，私門弟妹凋喪，七八年間貨用都盡。”如自咸亨元年（六七〇年）起算，則八年后為儀鳳三年（六七八年），盧照鄰尚在人間。“釋疾文”序又說：“余羸疾不起，行已十年。”說明此文之作為更后。文中還說：“今上好法，予晚受乎老庄。”這所謂“今上”，即令不是“新唐書”本傳所認為的是武后，也應該是中宗或睿宗，六八四年中宗在位僅一月，是談不上好法不好法的，最少睿宗垂拱元年（六八五年）盧照鄰還一息尚存，吟吐着他的絕命之辭，那時他已是五十以外的人了。

駱賓王的生卒年代也是沒有記載的，甚至連他是否被殺都有不同的說法，“舊唐書”本傳說他參與了徐敬業反對武則天的

斗争，“兵败被杀”，“新唐书”“李績传”附“徐敬业传”载敬业与宾王等失败后逃至海边，被徐的部将王那相所斩，凡二十五首，应包括宾王在内，“骆宾王传”却又说他是“不知所之”。此外甚至还有后来宋之问和他见面续诗而宋不相识的传说，但那是不可靠的，宋之问和骆宾王是相好的朋友，绝不会见面而不认识，兵败被杀的话是比较可信的。

“唐語林”卷二还有如下的记载：

骆宾王年方弱冠，时徐敬业据扬州而反，宾王陷于贼庭，其时善檄，皆宾王之词也。

如果真的在光宅元年（六八四年），徐敬业起事时骆宾王才二十岁，则他比王勃、杨炯的出生为晚了。这不仅和新旧唐书本传所述曾做道王府属、武功主簿，数上书言事，除临海丞，又弃官去到扬州的骆宾王应有的年岁不相合；就从骆宾王的文集中也可以看出，他在世的年岁是比较大的，如“与亲情书”说：“某初至乡关，言寻旧友，耆年者化为异物，少壮者咸为老翁，……询问子侄，彼亦凋零。”（卷七）“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启”说：“某散材易朽，……老不晓事，有类扬雄。”（卷六）古人不到接近五十岁，习惯上是不说老的，而这两篇东西又显然是在光宅元年徐敬业败死以前写的，所以“唐語林”的记载无疑是错误的，骆宾王的生年我推定最少应在此四十六、七年前，即公元六三八年左右。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卢照邻年龄最长，其次是骆宾王，两人都比王、杨大十多岁。闻一多除了根据这点（他认为卢骆平均比王、杨大十岁左右），还指出王、杨和卢、骆的性格、友情、作风上的某些不同，认为他们应该属于两个集团。他说：“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又说：“在那时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诗的正宗。……按时人

安排的順序，王揚的名字列在盧駱之上，也正因他們的貢獻在五律。”（“四杰”，載“聞一多全集”第三冊，二三、二九頁）這些說法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可是不管當初評文的人是怎樣想法，事實上“四杰”的稱號能在文學史上成立，並為廣大讀者所同意，我以為首先是因為他們在唐代文學特別是唐詩發展史上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他們共同反對了上官儀之流的文風，在客觀上和上官體形成了對立的局面，表現了改進齊梁詩的新的傾向。

楊炯稱贊王勃說：

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竟為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勃）思革其弊，用光志業。

所謂龍朔初年（六六一左右）的“文場變體”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呢？“舊唐書”“上官儀傳”說：

上官儀，本陝州陝人也。……舉進士，太宗聞其名，召授弘文館學士，累遷秘書郎，時太宗雅好屬文，每遣儀視草，又多令繼和，凡有宴集，儀嘗預焉。高宗嗣位，遷秘書少監，龍朔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西台侍郎同東西台三品，兼弘文館學士如故。本以詞采自達，工于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頗有學其體者，時人謂之上官體。

這“綺錯婉媚”的評語是下得很恰當的，和楊炯說的“爭構纖微，竟為雕刻”是一致的。“大唐新語”卷八曾載：

高宗承貞觀以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為宰相，嘗凌晨入朝，循洛水堤步月，徐巒詠詩曰：“脉脉大江（“全唐詩”作廣川）流，驅車歷長洲，鶻飛山月曙，蟬噪野云（一作風）秋。”音韻淒響，群公望之如神仙焉。象這樣的做詩和他的詩的內容除了取得封建大臣的羨慕外，有多大的意義呢？“詩苑類格”載有他的“詩有六對”：

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花草草是也；三曰連

珠对，萧萧赫赫是也；四曰双声对，黄槐綠柳是也；五曰迭韵对，徬徨放曠是也；六曰双拟对，春树秋池是也。

又有八对之說，分析詩的对偶也是极为細密的。上官仪的这些研究，对于律詩的創作不是沒有一定的貢獻，但是他把詩的創作局限在这些上面，就是异常錯誤的了。“全唐詩”卷二所收上官仪的詩共二十首，那些应制詩实不足取，如“早春桂林殿应詔”：

步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晓树流鶯滿，春堤芳草积。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花蝶来未已，山光曖将夕。

“婉媚”倒是“婉媚”极了；可是他所描写的景物和他的感情都不会被人民接受的，是和人民离得很远的。他的詩和那些模仿者的詩虽然大多是失传了，但“全唐詩”所收刘禕之、元万顷以下所做“奉和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一类的詩也看得出是受了他的影响的。上官仪的孙女兒上官婉兒也以詩文得武后的重用，中宗时进拜昭容，与諸学士賦詩唱和，“作辞甚綺麗”（“旧唐書”“后妃列传”），沈佺期、宋之間的作品也多經婉兒評定，他們也是受了上官体的一些影响的。

从楊炯的話証明，王勃和楊炯他們是有意識地和上官体作对的。而且楊炯还接着說：“卢照邻人間才杰，覽清規而輟九攻。”按卢照邻所称贊的是“凡所著述，多以适意为宗，雅爱清灵，不以繁詞为貴”（“駙馬都尉乔君集序”），这可以看出他的文风的傾向。我以为他最初可能对王勃有意見，但在龙朔以后看到王勃的反对上官体，便停止对王勃的攻击了。王、楊、卢、駱四杰的称号应该出现在这一时期（“新唐書”“裴行俭传”載行俭在吏部时，李敬玄盛称四人之才，引見行俭；又載行俭任吏部侍郎在，麟德二年，紧接龙朔后，这里可以窺見四杰称号出現的时期）。閻氏只看見他們的始异，忽略了他們的終同。虽然他也提到

“詩中的四杰是唐詩開創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的四位作家”，可是他把他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為浪漫、遭遇悲慘等詩人的才行命運和他們的作品的的作用糾纏在一起來考察了，主要的東西反而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樣，他自然最多只能“抱着‘息事寧人’的態度來接受”這個稱號了，實際上，閻氏仍然是傾向於把他們拆散開來的。我不贊成廢棄四杰這個稱號，是覺得不必也不能廢棄它的。

閻氏要根據年齡來拆散四杰，那麼李白長杜甫十一歲，我們不能稱為李、杜；孔融長王粲二十餘歲，更不能同列入建安七子了……。閻氏說王、楊和盧、駱的性格不同，系據裴行儉所稱“楊子頗沉默”（“新唐書”裴傳）之語，其實那正是裴拿來和“勃等……浮躁銜露”比較說的（從“唐才子傳”說楊炯“恃才憑傲”和他呼朝士為“麒麟援”的事看來，他也不見得會是怎樣沉默而不“浮躁”啊。），閻氏又拿王勃著述之多來反証其不會浮躁到那樣去，然而著述生涯並不一定能使人沉默下來，毋寧說常常是適得其反的。談到友情，盧、駱並未互相唱和，僅駱有“絕情代郭氏答盧照鄰”一詩，也不能證明其交情如何，反之，“朝野僉載”倒載有盧照鄰說過“喜居王后，耻在駱前”的話；王、楊雖有楊的“王子安集序”所說“蓋以投分相期”和很是稱贊王勃的話，但那文章是在王死後做的，如果有個人意見，當然不會再談，而在生前，他倒是說過“愧在盧前，耻居王后”（“舊唐書”本傳）的話的；而盧、王同游玄武山，並有詩唱和，駱、楊同與宋之間交好。總之，四人的友情，不會象閻氏說的那樣簡單，不一定構成兩組。

至於最重要的作風上的不同，也顯見得是閻氏就沈（佺期）宋（之間）和刘（希夷）張（若虛）的某些趨異來划分王、楊和盧、駱，其實王、楊和盧、駱在作風上的異點並不見得比同点多，如閻

氏說卢、駱与王、楊相反，是長于歌行而短于五律的，其實象卢的“折楊柳”、“梅花落”，駱的“在獄聞蟬”、“至分水戍”、“西京守岁”等五律是不能一笔抹煞的，而王勃的“采蓮曲”、“秋夜長”、“臨高台”等都是很成功的七言古詩，把王、楊限于五律、卢、駱限于歌行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王世貞“藝苑卮言”說：

王、楊、卢、駱，号称四杰，詞旨华丽，固緣陳、隋之遺，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

能够注意到四杰除了写作七言歌行（只有楊炯沒有七言传下来），还都在五言律詩方面为后来的建立者沈佺期、宋之間等奠定了基础，那末就不会象聞氏那样，把李商隱“漫成五章”之一的“沈宋裁辭矜变律，王楊落笔得良朋”的王、楊只解为王勃和楊炯，說沈宋所繼承的只是他們兩人，而沒有包括卢、駱在內了。胡震亨“唐詩談丛”說：

“当日自謂宗師妙，今日唯觀对屬能”；义山自咏尔时之四子，“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少陵自咏万古之四子。

他就是正确地“王、楊”作为四杰的省称来理解的。

二

四杰詩和那以写应制詩或入朝詩見长的上官体詩不同的地方，还不单纯是文风的纖細与否，其實是有着內容上的根本歧异的。上官体局限在大臣生活的狭小圈子里，限于单纯的描写殿苑风光，用空虚的詞藻来歌颂皇帝和皇族，那样的內容是反动的，它的“婉媚”，即卢照邻所反对的“以繁詞为貴”，正是它所以能迷惑人，也即是它的毒素的所在。而四杰詩的題材范围相当寬广，它的表現力的深度和感情上的較为接近人民是应该得到重視的。

四杰虽然仍然是齐、梁詩的繼承者，但是已經有了一些改进，他們作品的內容和題材比較广闊丰富，他們的文风也比較活泼剛健。“中国詩史”曾經把齐、梁到陈的新体詩的十多个主要作者（謝朓、沈約、江淹、王融、吳均、何逊、庾肩吾、蕭綱、徐陵、阴鏗、江总等）的詩分为三类，即写景的、抒情的（以輕艳的宫体为主）和咏物的。如果我們把四杰的詩也归入这三类，那么就必須說明，四杰的抒情詩的內容是大大地丰富了，写景、咏物的詩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展。

下面我将分类來論述四杰的詩，它們的丰富內容和所达到的艺术水平。

首先是談抒情詩，因为不論是从数量、內容或艺术价值說，它都是四杰詩中的一大类；它是四杰詩的主要的东西。

他們的抒情詩的第一个方面，是写离别和怀乡的感情。这样的感情既是詩人們自身生活遭遇的反映，也是广大的同命运者的共通的感情。象游学、求官、宦游、赴边，常常是封建社会里的士人探求政治出路的生活經歷，在失意中常常会唤起这样的感情來。四杰在这一方面的詩以王勃写得最好。象他的“落花落”有句写怀人道：

落花飞，撩乱入中帷，落花春正滿，春人归不归？

“寒夜怀友二首”之一：

复閣重楼向浦开，秋风明月度江來，故人故情怀故宴，相望相思不相見。

这些很有乐府的意味，何景明說：“唐初四子……音节往往可歌。”（“明月篇”叙，載“明詩綜”卷三十）王世貞說：“子安稍近乐府。”（“艺苑卮言”）是不难得到証实的。而下面的詩則是完整

的律詩了：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問津，悲涼千里道，痠斷百年身。心事同漂
泊，生涯共苦辛，無論去与住，俱是夢中人。

——“別薛華”

城闕輔三秦，風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內存知
己，天涯若比邻，无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由于王勃对于友情的真挚，所以他才能写出这样有感染力的送
別詩来。他还写了不少美丽的小詩，发抒同样的情感。象“别人
四首”之一：

久客逢余閩，他乡別故人，自然堪下泪，誰忍望征尘。

王勃的怀乡詩也是写得非常动人的，他把深沉的感情結合
着当前的景物写出。象他春日怀乡的詩有：

客心千里倦，春事一朝归，还伤北园里，重見落花飞。

——“鬪春”

客念紛无极，春泪倍几行，今朝花树下，不覺恋年光。

——“春游”

秋日怀乡的詩有：

去驂嘶別路，归雁隱寒洲，江皋木叶下，应想故城秋。

——“临江二首”之二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屬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山中”

早是他乡值早秋，江亭明月帶江流，已覺逝川伤別念，复看津树
隱离舟。

——“秋江送别二首”之一

而他的“蜀中九日登玄武山旅眺”里的“人今已厌南中苦，鴻雁那
从北地来”是比和他一同写此題的卢照邻、邵大震等人的詩为別

有新意的。

楊炯所写的詩現存者較少，但他所写离别的詩也有几首，“送临津房少府”是写得較整齐的：

歧路三秋别，江津万里长，烟霞駐征盖，弦奏促飞觞。阶树含斜日，池风泛早凉，贈言未終竟，涕泪忽沾裳。

而“途中”一首写游子的悲哀，直似汉魏风致：

悠悠辞鼎邑，去去指金塘，途路盈千里，山川五百重，风行常有地，云出本多峰，郁郁园中柳，亭亭山上松，客心殊不乐，乡泪独无从。

卢照邻也写了一些送别和怀乡的詩，較好的如：

津朝朝行远，冰川夕望曛，……誰忍仙舟上，携手独思君。

——“晚渡渚花敬贈魏大”

离人丹水北，游客錦城东，别意还无已，离忧自不穷，……送君秋水曲，酌酒对清风。

——“送郑司仓入蜀”

九月九日眺山川，归心归望积风烟，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

——“九月九日玄武山旅眺”

骆宾王写的离別詩比楊炯、卢照邻为多。他餞别宋之間的詩写道：

淮沂泗水地，梁甫汝阳东，别路青纒远，离尊綠蚁空，柳寒凋絮翠，棠晚落疏紅，别后相思曲，凄断入琴风。

——“在兖州餞宋五”

此外他的“送吳七游蜀”、“别李嶠得胜字”都是很好的贈別詩。“于易水送人”是一首小詩，他通过燕丹送别荆軻的故事，表现了悲壮激昂的感情：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他还写过怀念故乡的游子詩，如“冬日野望”、“西京守岁”，大有